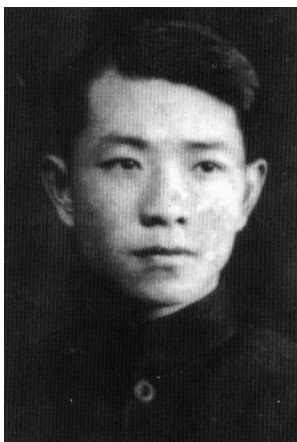


两件鲜为人知的事

○于光远（1936 物理）



1936 年于光远大学毕业后的照片

编者按：于光远，1915 年 7 月 5 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 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 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 1935 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7 年 3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涯，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13 年 9 月 26 日在北京逝世。本文的两个小故事节选自《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 年 6 月），题目为编者所加。

镜子背后的禁书

1936 年 1 月中下旬，清华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同学们回到了学校。“民先队”成立，并且按大队、小队组织了起来。没有参加宣传团的进步同学陆续加入。就清华一个学校的情况来看，抗日的力量在迅速增长。那时由于我不再是孤立的，就可以经常听到一些报上没有登出的消息，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学生的镇压活动。在 2 月初的一天，我起得比较早，走出房门，在走廊上看到有六七本书。捡起来一看，都是很想看的宣传革命道理的书。它们怎么会被扔到走廊上？我一下子就明白，那就是这些书的主人知道形势紧张，放在自己房内会影响他本人人身安全，因此就采取这种办法来处理。我一看走廊上没有别人，就捡起来往厕所跑。我们的厕所是许多个宿舍公用的，挂有三面镜子。我灵机一动，把这六七本书分别放在每面镜子背后。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发现。这个厕所所有三个马桶，分别在三个用木板隔开的“小房子”里。人在里面可以把门关起，别人打不开。我就拿了一本，坐在马桶上看。看后，站起来发现厕所里没有人的时候，很快地把书放回到镜子背后去。要看的时候，也是趁没有人在，从镜子背后取出一本，然后坐到马桶上去。那几天，我上厕所次数特别多，似乎是老泻肚子，也

似乎便秘。坐在马桶上一本一本地看，薄的一次看完，厚的两次三次看完。这六七本书在几天之内就都看完了。有的书想学得更深一些，就看第二遍。那些书中有一本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一本是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的摘译本，书上没有印着这本书是斯大林写的，也没有用约瑟·维萨里奥诺维奇，而是用另外一个名字，讲的是革命战略策略问题；一本是文艺方面的，书名是《新兴文艺概论》；有一本是专门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揭露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几个历史事例，把蒋介石称作新军阀；还有两本是残书，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很薄，都只有二三十页，内容是讲长征和毛泽东的……这些书都是用明朗的无所顾忌的语言来写的，写得很透彻，看起来倒非常痛快，很“过瘾”。

看完之后，我仍然把这些书留在镜子背后。我只知道在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它，没有人动过它。看完后过了好几天，仍旧没有人动过。我也不再去管它们了，不知道这些书以后的命运如何。也不知道在我不再去读它们之后，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去读这些书。这些我就不管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读它。

在抗战前的国民党统治区，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弄得不好是要坐班房的。但是这样的书革命者又不能不看。不看，提高不了自己的觉悟，又怎么能做一个有理论和政治觉悟的革命者呢？同时，能看到这种书也不容易。国民党有一个书报检查制度，有的书的内容离现实远一些，也许不那么管。比如我就看过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一部分，翻译的文字很差，

读起来非常吃力。而有一些书，则不能公开出版，或者公开出版了不许发行，成了禁书。越是禁书，人们一旦得到，看起来特别认真，获得的印象特别深刻。这种书通常在革命者之间用很快的速度传阅，与革命组织有关系的人比较容易得到。在“一二·九”前，我是个单干户，没有人传给我看。后来听说不少人看过这类禁书，其中有一本华岗写的《大革命史》。看过的人都说特别有教育意义。加入“民先队”后，暂时也还没有人传给我这种书。捡到这几本书我真是高兴。我通过这样的途径看过这样的几本禁书，的确是很特别的。不但当时很高兴，就是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挺有趣。我老想这几本书是哪个同学扔的，他一定住在新斋，但一定不是我们那条走廊的。看来他是一位文艺爱好者，其他的几本书上都没有字迹，只有那本《新兴文艺概论》上画有许多杠杠。

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1937年2月，我在广州收到了民先总队部负责人李昌的来信，他要我辞去岭南大学教师的工作，尽快回到北平，到民先总队部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我将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我没有犹豫，立即回到了北平。因为我的家人一直是主要靠我的工资生活，现在一下子辞去了工作，从此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无法再贴补家用，不但家里会问，朋友们也会问，总要找个合理的借口才行。我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这借口自己送到我跟前来了。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法国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准备在中国招收一名研究生。我跟家里人

□ 怀念师友



1985年清华校庆时与老同学钱三强（左）合影

说当一个助教没有出息,我要报考研究生,去北平应试。

有了这个借口,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没有怀疑,可是这件事也总要找到一个台阶下来才行。这个台阶也是自己送到我的跟前的。当知道同班同学钱三强也准备应约里奥·居里招收研究生的考试时,我真高兴极了。他使我有了一个不去报考的借口。我对大家说,我不想和同班同学争这个名额。我想自己在系里的学业成绩,同钱三强互有短长。我见长的是数学和理论分析,钱三强见长的是动手做实验。可是考试不靠动手的本事,我会占便宜。总之我还是有竞争力的。我的退出,也还得到了不少好评。这些好评完全是白捡的。而我最大的好处是,这么一来,我马上能在民先总队部工作了。

不久之后考试成绩揭晓,三强被录取了,我非常高兴。他当约里奥的学生比我合适。三强动手做实验的能力比我强,他在中学又学过法文,我相信他一定会学得

很好,而且一定会有很高的造诣。在他被录取之后,他就开始整理行装,准备赴法。在他出国前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要我在他的纪念册上写几句话。我就写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事情果真这样:三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在亚洲大陆就是日本投降后,回到祖国,在清华授课,没有多久北平就解放了,他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64年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到中国来,参加我国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有一天会议休息,我们和坂田昌一教授一起在颐和园的船上聊天。三强对坂田讲了我在他纪念册上留言的故事。三强的故事,引起坂田很大的兴趣。回日本后,坂田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科学界的新风貌》,书中转述了三强讲的这个故事,说这是中国科



2006年4月,于光远学长(左3)毕业70周年返校参加校庆活动于甲所,左1为校友总会副会长承宪康,右2为1936级召集人胡家驹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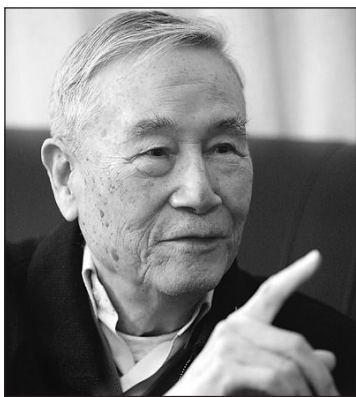
学界的一段“佳话”。

1964年，我就想看看三强那本纪念册，几次到三强家里都忘了提这件事。1990年又想起这件事，打电话给三强。

他让人转告我，这本纪念册在“文革”期间非常遗憾地被销毁了，成了一件憾事。为此，今天我讲这段故事时，不能准确引用我当时写的原话了。

逝者叶笃正

○许荻晔



叶笃正先生

1916年，中国有了第一份气候记录。也正是这一年，在天津一位清末道台的家，叶笃正出生了。这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资深院士、中科院原副院长、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名誉所长，在气象领域耕耘七十余载，亦在新中国的气象科学发展史上深深烙下自己的名字。2013年10月16日晚，叶笃正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

10月20日上午，叶笃正遗体告别仪式于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叶笃正的亲朋、领导、同事、学生等1000余人前来送别。

叶笃正1916年2月21日生于天津望族，父亲叶崇质30多岁便任直隶巡警道，相当于警察厅长，天津的警察系统即由其创建。叶崇质有三房夫人，11个儿子，5个女儿。叶笃正为其第七子，与三哥叶笃义（民主人士、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五哥叶笃庄（农业史专家、《物种起源》、《达尔文全集》译者）、六哥叶笃廉（曾任中央党校理论部副主任）、九弟叶笃成（后改名方实，新华社老领导、《炎黄春秋》顾问）并称“叶氏五兄弟”。

叶笃正幼时受私塾启蒙，初中跟叶笃成同期进入南开中学。因为不想“屈尊”跟弟弟念同一年级，初一暑假期间，叶笃正突击两个月功课，直接跳级考上初三，这使他得以进入南开中学人才济济的“1935年班”。这个班出了3位中科院院士，除叶笃正外，还有化学家、教育家申泮文及地质学家关士聪，此外，美国工程院院士刘维正、诗人穆旦等亦是叶笃正的同班同学。而依照申泮文的说法，叶笃正是全班的榜首。

叶笃正的求学阶段，始终伴随着偌大